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5~3

2015年2月4日

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张林南口述史¹

我祖籍河北省邢台地区平乡县东田村，祖父是当辈子发家、当辈子破产的地主兼高利贷者。父亲张玺就读于河北省邢台第四师范。他1931年加入共青团，任邢台地区三个学校的团总支书记。1932年，20岁的父亲在领导学潮中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转押至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坚持狱中斗争，1934年在狱中转党，1936年10月出狱。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1948年南下，任中共豫西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9年5月至1952年底任河

¹ 2008年11月，张林南口述，吴淮阳记录；2009年1月下旬，吴淮阳整理出初稿；2009年2~7月，张林南边照顾癌症晚期瘫痪的妹妹边修改、补充；2009年7月31日，吴淮阳收入书稿《老五届人生路》内部发行；2009年8月25日，张林南修改自留稿；2015年1月26日再修改完成。

南省省委书记。1952 年底调北京，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计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1956 年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 年 1 月 8 日病逝。我母亲陈伯仲于 1937 年参加革命，1938 年 16 岁入党，长期在冀鲁豫根据地从事群众与妇女工作，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妇联组织部部长，全国妇联福利部、国内工作部副部长、代部长，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 年调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任研究员，因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大跃进、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曾受到批判。

1945 年 3 月，我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河南省林县。由于父母调动工作，我小学转了三次学，上了四个小学：开封五小、北京象鼻子中坑小学、华北西苑小学、育才小学。我在华北西苑小学读了二至五年级，时间最长。那是一所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衣食住学校全包，学生们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继承了妈妈的性格，从小胆子大、勇敢、爱打抱不平。学校里有一个坏风气，那就是男同学爱欺负女同学。班里的男同学有“大王”、“二王”、“三王”，同学们要将周末从家里带回来的零食向他们“进贡”。我不懂那一套，也不进贡。有的男生特调皮，将毛毛虫籽放进女同学的书桌里，几天后孵出小毛毛虫来，女同学吓得直叫，他们看了高兴。还有的男同学从树上捉了大青虫子，放在女生脖子里……我不怕虫子，他们从没招惹过我。有一天，一个男生把刚从外校转来的一位女同学挤在墙角打，我发现后立刻叫来一群女生，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学校里有的同学爱显摆自己的父亲官儿大，说：“我的爸爸是什么什么官，是管你爸爸的！”在这所干部子弟小学里，有些孩子有封建主义思想，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每到周六，不少家长的专车来接孩子，在马列学院（即现在的中央党校）学习的母亲则是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同住三里河计委宿舍的同学乘坐公共汽车一起回家。

我问母亲：“咱们家也有车，为什么不来接我们？”她说：“那是你爸爸工作用的车，不是咱们家的车，我和你都不能用。”

为了防止我们有干部子弟优越感，母亲多次对我讲，她怀我的时候，正在太行山冀鲁豫中央分局整风大队参加整风。那时，只有南瓜吃，她见了南瓜就吐，不能吃饭，因此我生下来才三斤重。她没有奶水，村里的一个妇女干部刚生完孩子，就用自己的奶水奶我，我才活了下来。我长得黑，妈妈说是因为吃了那位“黑妈妈”的奶。妈妈从整风大队毕业后，是林县的地下交通员用筐子挑着我，她扮装成农村妇女，骑着毛驴，穿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才把我们母女平安地护送回妈妈的工作地点。所以妈妈老说：“你的小命是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给的，长大了要对得起人民！”她还告诉我说，怀我弟弟八个月时，她打摆子，当时正与敌人展开拉锯战，她被抬在担架上向黄河以北撤退。弟弟生下来是金黄色的，不会哭也不会吃，妈妈怕增加部队的负担，让把弟弟扔掉，后方医院的院长坚决不放弃，又灌中药又找羊奶，弟弟才活了下来。妈妈对我们说：“爸爸妈妈只是生了你们，你们的命是党和人民给的，将来要好好为党和人民工作！”对我来说，母亲的话是点滴成自然，我从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干部子弟有什么优越性，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最普通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总是想一定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回报党和人民给我的恩情。这是我一生的原动力，是我的根。

1957年，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意思是，为解决干部子弟脱离群众问题，撤销一批干部子弟学校。华北西苑小学在撤销之列，我被分配到了育才小学上六年级。毕业时，我报了女三中，因分数高，老师说可以报更好的学校，我就改报师大女附中，于是被“女附中”录取了。我对父亲说：“听说‘女附中’的人都很骄傲！”我爸爸哈哈大笑，说：“难道一个学校的人都骄傲吗？你上了‘女附中’也骄傲吗？”

我入学那年正赶上大跃进，学校老师出去炼钢，我们在校搞试验田，挖地一丈多深，然后一层土一层肥地填上，在上面种小麦。我们还下乡去割麦子，收大白菜，在校办工厂劳动。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我感到最难的是，老师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做一首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诗，真把我难坏了，连吃饭、走路都在想词儿。

1959年1月8日是我一生一个重大转折的日子，这一天我的父亲病逝了。从这天开始，我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那天上午，还没有到放学时间，突然有人到学校接我，车开到了肿瘤医院。我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屋里站满了人。13岁的我还很不懂事，并不知道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人家有爸爸，我没有爸爸了！”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和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到我家来看望，他们对我妈妈说：“你哭出来吧，哭出来能好过一点儿！”我妈妈很坚强，她不哭。问她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说，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走了，我今后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把孩子们培养成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康妈妈和邓妈妈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他不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做像你爸爸那样的人！”许多叔叔阿姨都讲到我父亲点点滴滴的感人事迹，父亲的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在我心中清晰起来。爸爸的老秘书刘洪声叔叔对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周总理，我最敬重的就是你们的爸爸！”我还亲眼看到妈妈在我父亲去世后公私分明、坚持原则的处事态度和方法。我父亲骨灰安放以后，她立刻向组织上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搬出百万庄申区的部级干部的房子，她说：“申区的房子是分配给张玺的，我和孩子不能住！”这样的报告她写了很多次，一直写到“文革”前，但组织上没有批准。她把家里的地毯、沙发、电扇等公家配给的东西全部上缴了，在我们孩子的强烈要求下，才保住了电话。父亲去世后，组织上

按中央的规定给我们家发抚恤金，我妈妈也给组织上写信表示不能要，她说：“我有能力抚养孩子，张玺去世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我不能再给组织上增加负担。”信也一直写到“文革”初期。所有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想爸爸，看看妈妈，我好像突然长大了，懂事了，我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成人，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人。

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怎样刻苦锻炼自己，才能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于是，我有了空前的动力，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每天记日记，“吾日三省吾身”，督促自己成长。我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还严格管理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抱怨说：“姐姐管得比妈妈都严！”我订了《中国青年报》，积极地向英雄学习，如舍身救火、保护国家财产的向秀丽，纺织行业的劳模赵梦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榜样侯隽、邢燕子、董家耕，罗北青年垦荒队等等。我初一就入了团，初二当了团支部书记。初三时，《毛选》出版了，我开始学《毛选》。那时还没有提倡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我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种朴素的感情去读的，一读就爱不释手。在我的倡议下，每一个革命老前辈去世，我们就开一次会纪念，畅谈老前辈的事迹，表示继承先辈的遗志，接好革命班的决心。那时我强烈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革命前辈优秀，革命事业就不会在我们手里继续发展。

但是，我也有困惑的时候，比如发展团员要讲出身，出身好的先入团，出身不好的后入团，有些同学甚至一直不能入团。在家里母亲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教育，我是普遍地热爱我的同学们。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要求进步，是我的好朋友，我认为她应该入团，但是学校说不行，因为她的父亲是右派。还有一个同学，学习特别好，是班里的尖子，因为出身不好，直到毕业都没有入团。我到高中后，担任校团委委员，郭沫

若的女儿入团申请，第一次就没有被批准，原因是她的父亲曾经自动脱党，第二次才通过。这个问题是我心中的一个问号。还有一个不能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我非常喜爱的电影，受到批判，如《流浪者》、《忠诚》等。我看电影时，都流了泪，看了以后还推荐给同学们。到了高中后，这些电影受到批判，说是宣扬人性论，我心里不理解。回想起来，正是从那时起，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直主导我到“文化革命”的中期。那就是，当我内心原生的、朴素的东西与党的路线合拍时，我会积极热情地去宣传和实践；当它们对立时，我会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而到我经过反省和改造，跟上了党的路线时，那就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不太爱看小说，对社会了解很少，知识面不宽，思想过于单纯。

我们上初二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我们学校食堂喝菜叶子粥，吃地瓜面窝头。我们去郊区背大白菜，拔麦子，养兔子。我们家不要组织上给的补助，我姥姥带我们去玉渊潭挖野菜。我弟弟老叫饿，回家吃得很多，我批评他说：“每个人都是有定量的，你吃那么多，姥姥和妈妈就少吃了，你适可而止吧！”弟弟对我有意见。现在，他开玩笑说，他的大肚子是小时候挨饿的结果。那时，在同学中传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我带领我们班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的健康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请你们为了人民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年轻人可以减定量！我们开了一个班会，自报减多少定量，尽管大家都吃不饱，多数同学都减了两斤定量。

初中毕业时，我向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觉得人家都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我们学习太平淡。于是，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到罗北青年垦荒队当垦荒队员。团中央回信说：“你们年纪小，要以学习为主，将来再为人民做贡献。”学校给我们做工作，

让我们安心学习，我们只好放弃。

我考上了本校，继续在师大女附中上高中。高中时，学校的政治空气更浓了，中央陆续发表了评论中共与苏共分歧所在的文章，一共九评，这也成为我们政治学习的内容之一。在同学们中间，反修防修深入人心。我们开过一个班会，会上，结合反修防修和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谈我们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位同学发言时，因为太激动，竟然晕倒了，可见那时候我们的革命热情高涨到了何等程度！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晚自习都看毛著，宁肯耽误学习，也要看。我是真心实意地读，有时会读到拍案叫好的程度。那时，全国树立了大寨和大庆两个典型，我妈妈去过这两个地方，带回了材料，我都看过，知道了陈永贵和王铁人的事迹，我感到心里热气腾腾的。

高中毕业时，我依然想像侯隽、邢燕子、董家耕那样，去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时学校对我们的教育是，考不上大学，再去农村插队，当新一代的农民。而我和班上的一些干部子弟一起酝酿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农村当农民。我们认为，不考大学就去农村当农民才是光荣的，考不上再去就有点迫不得已。我们给在河北省宝坻插队的知青先进典型侯隽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她那里插队。侯隽回信赞扬了我们的革命热情，但是，她劝我们还是应该先考大学。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教育。教导主任召集我们开班会，他说：“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我们有的老前辈住在医院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么对待老前辈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懂医学。所以，我们要大力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革命才有保证。你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继续深造，考不上大学再去农村也不晚！”我听老师讲的有道理，就抱着“当工农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决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想报考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却让我报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我姐姐、姐夫都是人民大学的调干生，我以为人民大学是专收调干生的，所以不想报人民大学。我妈妈的朋友来给我做工作，她女儿丹林是比我高一届的师大女附中学生，她考上了人民大学党史系。我问：“党史系是学什么的？”这位阿姨说：“是学毛泽东思想的，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干什么不行啊？”我听了很高兴，就把人民大学党史系报为第一志愿。

1964年8月，我收到人民大学入学通知书，录取我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入学后不久就“下连当兵”，有一位和我编在一个班的同学告诉我，她第一志愿报的是国际政治系，却被分到了党史系。我俩一通气可高兴了，我俩可以换系了，都可以上自己喜欢的系了。入学教育结束，我俩去找分管教务的副校长，要求换系。副校长把我俩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我俩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副校长将我找去，他说：“我和你父母亲一起工作过，你考‘人大’我知道，你考得不理想，是你们学校把你推荐来的，学校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你写了入党申请书，政治热情高。为什么把你分到国际政治系？因为你政治上可靠，家庭出身好，这个系的人将来是要外派的。那位同学有海外关系（她父亲是北大教授、印尼华侨），因此不能上国际政治系。”我听了副校长的话，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方面下决心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另一方面我也为那位同学感到不平。我们高中班有十个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出身不好”未被录取，我也为她们感到不公平。

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共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专业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班35个人，两个女生，有五个干部子弟，其他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一半以上是原来中学里的团支部书记。第一学期的班干部是指定的，我当团支部委员。入学第一天，每人发一个小马

扎，一个部队用的小针线包，一个班一套修鞋工具、一套理发工具。学校要求我们保持和发扬人民大学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入学教育一是劳动，拔校园里的草；二是看《早春二月》、《以革命的名义》等电影，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阶级斗争观念，立志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三是端正学习目的，每个人都要讲讲自己为什么考人民大学。有的同学说为了将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想当外交官，有的想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还有一个同学说上了人民大学可以看《参考消息》。大家敞开思想，讲得既率直又天真。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入学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十天后，就让我们“下连当兵”，到昌平第三工程兵学校锻炼一个月。我们除操练外，还学习了摆地雷阵等军事技术，大家感觉很新鲜，很高兴。

大学一年级主要学基础理论，如党史和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发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没有讲。我们班里的学术空气很浓，大家都能敞开思想，自由发表意见。在一次哲学课的讨论会上，班长发言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能一分为二，那对毛主席能不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能！毛主席很伟大，但是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所以也应该一分为二。”团支部书记说：“对毛主席怎么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不能，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并列，是绝对正确的！”老师没有批评班长，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班上少数人同意班长的意见，多数同意团支部书记的意见，我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从普遍意义说，对毛主席也能一分为二，但从感情上讲，毛主席一贯正确，不容怀疑。还有一场辩论会，那次是学习讨论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在掀起“反修防修”运动的背景下，周扬说：“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上正在兴起学雷锋的高潮，会上

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做雷锋式的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雷锋式的人物哪一个对社会的贡献大？以班长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重要，雷锋只是普通的人，我们的目标应当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我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雷锋是革命的螺丝钉，放在哪里都能用，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让他学理论，他也能成为理论家。我们要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要向雷锋学习，做雷锋式的人物。我崇拜英雄，雷锋、焦裕禄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楷模。

我很热爱我的班集体，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同学，常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牢记毛主席关于干部子弟不能脱离群众的教导，虚心地向工农子弟学习，和他们交朋友，我和大家的关系非常好。有的同学们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上大学时妈妈给我买的“基洛夫”手表成了大家的共同财产，同学们轮流戴。一年级放暑假，班里有些同学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回不了家，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请妈妈帮助这些同学，让他们能够和家人团聚。妈妈给了我两百元钱，我分给了这些同学，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家了。1965年8月5日，在大学一年级暑假，我入了党。

“文革”前夕，1965年，学校组织我们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在班里的讨论会上，团支部书记将矛头直指班长，他说班长“学术走错了方向”，“怀疑毛主席，认为毛主席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是怀疑一切”，还说班长“反对学雷锋”等等，班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俩从此分道扬镳。我看出支部书记是有意拉班上的人整班长，我不同意他这样做，我认为班长是一个好人，他并不反对毛主席，我很同情他，会上我不发言。班长被批判之后，不大和别人说话了，但是，他经常来找我讲讲心里话。他看了许多马列的原著，还指导我看一些书，我知道

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我很佩服班长对科学的执著精神。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做到像班长那样是很不容易的。

1966年6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后，大家开始给校党委和系里领导写大字报。当时，我是我们班“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没有看出校党委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写大字报。对别人贴出来的大字报，我一篇篇认真地看，发现有的大字报有不实之处，感到很生气，心想都是搞政治的，怎么能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呢？有一次，我看到系里老师写的一篇批判系党总支的大字报，里面有无中生有的东西，我就去找他们，当着这些老师的面说：“你们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怎么能不实事求是呢？那个会我参加了，我怎么没有听到你们批判的这些话？”他们无言以对。

我们班的一些同学，把矛头指向了我们系的党总支专职书记（女）。他们让总支书记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甚至做出揪头发的粗暴举动，还企图砸存放档案的保险柜。我坚决反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劝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给校党委和系总支的领导写大字报，但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抱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提意见，而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泄私愤，图报复。”他们嘴上没有反驳我，心里对我肯定非常不满。

大概是7月底或8月初，党史系的几个干部子弟来找我，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希望我们系的干部子弟也参加。我很反感他们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为此，我和系里另外两个干部子弟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干部子弟脱离工农子弟，成立自己的组织的不满，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纠正这种倾向。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几天后，以我们

系四年级工农子弟为核心，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学校的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对待郭影秋的态度上却截然相反。²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郭影秋的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郭影秋。我是坚决保郭校长的，因为他在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中的口碑很好。他工作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对人民大学干部由于历史原因不团结的问题提出了“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正确方针，他对教育改革有许多新思路……。

8月份，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反郭影秋的大字报〈揪出人大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郭影秋〉，题目每一个字占一张大字报纸，内容空洞无物，但用词尖刻，说郭校长提出的“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郭影秋在“四清”中（郭是人民大学“四清”工作队总负责人）保护了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我正好看到和我一个党支部的我系一年级的一个党员带着几个人在贴这张大字报，当场质问他：“你凭什么写这样的大字报？你的材料呢？是谁让你写的？”他说：“是党史系的某某老师让我们写的，他们有材料。”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巨大轰动。我对这种乱扣帽子的所谓造反行为非常反感，我认为在背后指使学生的老师动机不纯。这时，“四清”回来的我校师生纷纷写大字报保郭影秋，讲了许多郭校长在“四清”中的感人事迹。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决定去“四清”点上做调查研究。当时还不大会骑车的我借了一辆破旧的28男车，一路跌了数不清的跟斗，行程60多里，终于到了“四清”点苏家坨。在那里住了几天，走家串户地调查，得出了我们自己的结论：“郭影秋不仅不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不是走资派，而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回到学校后，我们几个人

² 郭影秋，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党委书记，“文革”初期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写了一张保郭影秋的大字报，我签了名。

大概是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陶铸主持大会，邓小平等中央首长也来参加，辩论郭影秋到底是什么样的干部，两派一对一地发言。那天辩论非常激烈，反郭派说郭影秋是四类干部，一无是处；保郭派说郭影秋是一类干部，这样好的干部少有。会前，保郭影秋的不知什么人把开辩论会的消息传到了苏家坨，结果当天苏家坨来了五百农民参加辩论会。这场辩论会以后，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上说，郭影秋调五百农民进城来保他。后来郭影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些“铁杆保郭派”不甘心，曾冒着大雨到国务院信访局反映情况，说明不是郭影秋调农民来保自己，说郭影秋的确是好干部，为郭校长鸣不平。

1966年9月，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大操场接见红卫兵，要求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去串联，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去。当时北京有关领导把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组织了四个大队，我和我们系的十几个人作为第四大队第三中队的成员前往广州，我们之中大多数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广东省委对我们这些从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很重视，安排我们住进省委招待所。我们在省委看大字报，到广州的大学里面跑，参加一些学生和群众的集会。还在公共汽车上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十六条”。不久，在省委机关礼堂召开了省委的干部大会，让我们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我也作为代表之一上台发了言，讲了“文革”在北京、在大学里是怎么搞起来的，毛主席对“文革”如何亲自指导，寄予怎样的期望。并针对我们看到的广州的情况，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呼吁大家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天晚上，赵紫阳、林李明、

欧梦觉等省委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座谈。记得我和赵紫阳还辩论起来，他说：“我们广东省是祖国的前沿，面对香港和台湾，一定不能乱，不能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我说：“我们认为广州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人们缺少革命热情，都很温良恭俭让！”想想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回家后和母亲讲起这件事，被我母亲批评了一顿，说我太偏激。

10月中旬，我们从广州北上，先去了湖南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又到了南昌，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然后坐汽车上井冈山，边参观革命圣地，边重温党史。下山时，汽车开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井冈山分校时坏了，我们都下了车。学生们知道了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后，要求我们讲讲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讲了以后，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激发了他们投入“文革”的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学校的秩序乱了起来，引起了吉安地委的不安。地委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来路，说我们把学校搞乱了，把我们扣住不让走了。我们在井冈山分校住了好几天，和学生们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地委放我们走时，学生们送我们每人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还有竹子做的扁担、水桶、笔筒，还送了一个他们自己种的40多斤重的大南瓜。我们回到北京后，把这些礼物毫无保留地捐献给设在北京展览馆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了。

1966年11月初我们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人还不多，都在外面串联，所以，我们又组织了一次步行串联。这次我们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步行串联的宗旨是：重走长征路，一路搞社会调查，从事革命实践，通过实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史，自己教育自己。路线是从北京一直走到瑞金，再从瑞金开始沿着长征路线走，到达延安，最后走回北京。“长征队”人员22人，其中我们系的人最多，还有党史系、哲

学系、农经系的六个同学，另外吸收了两个“人大附中”的初中生和两名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同学，年龄从14岁到28岁，党员占了一半之多。为了走完“长征”的艰苦里程，根据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指示，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选举了书记、副书记和长征队队长，我当卫生员，负责背药箱。我们背着行李、《毛选》和油印机、纸张，还有一套《收租院》的图片，平均每人负重30斤。我们还特制了一面写有“长征大学”的红旗。出发那天，先坐车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长征的起点，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就举着大旗出发了。

第一天我们走了七八十里，到白洋淀住了下来，这里是抗日战争中让日本鬼子丧胆的大片芦苇荡。我们请参加抗日的老乡给我们讲抗日的历史……。第十天，我们到了饶阳县五公村，这是冀中平原首先搞合作化的村子。解放战争时期，耿长锁和徐树宽夫妇率先办起了互助组，以这个互助组为核心，办起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一个合作社。我们走家串户，了解历史，搞社会调查。来这里的中学生多，大学生少，而大学文科生我们是第一批。耿长锁提出一个请求，让我们帮助他们办一个展览，不然来参观的红卫兵太多，他们老得讲，耽误生产。我们答应了，开始办“五公村村史展览”。我们早上五点半起床，半天劳动，另外半天一部分人收集材料，办展览，一部分人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搞社会调查。

1966年12月，党中央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政策，我们的社会调查又扩大了几个点，扩展到深县。每天早上我们分工，有和社员一起劳动的，有到各个点上搞调研的，晚上开碰头会，交流情况，写调查报告。在深县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看到这里一些农民特别穷，住的房子类似猪圈，床上就一张草席子，连被子都没有。而有的房子非常好，有门楼，还有二层楼的。住好房子的都是干部，群众对大队干部很不满，认为他们多吃多占。我们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四清”了。

我们每走一户，送一张毛主席像，有的老乡称我们为“青天”。

不久，天津大学来了一批红卫兵，说他们是来贯彻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的。他们横冲直闯，蛮干，把耿长锁夫妇打成了走资派，把我们打成保皇派，说我们右倾。他们说：“你们要做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村里一些人受了他们的影响，想批判我们，但是没有形成主流。他们的到来，完全打乱了五公村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我们对他们非常反感。

1967年2月，“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求结束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尽管我们的宏伟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各方面的收获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机会参加“四清”的人，接触和了解了农村的一些情况。我们写了调查报告，回北京后递交给国务院信访局。

回到学校后，两派斗争升级，闹得很厉害。保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新人大”，全校70%以上的学生、老师，90%的党员、干部和99%以上的工人参加了“新人大”，是多数派；反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人大三红”，是少数派。后者尽管人少，能量不小，自封为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视“新人大”为保守派。“人大三红”抄了郭影秋的家，想办一个展览，结果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抄出来，抽屉里翻出不少三年困难时期补助他的副食品票，他都没有用。他们自己说：“这只能是一个呈现郭影秋艰苦朴素的展览。”办了没几天就撤了。“新人大”将副校长孙秧打成走资派，把他关在图书馆楼的一个屋子里，有一天发现他自杀了。“人大三红”占领了教学大楼，“新人大”占领了图书馆大楼，各有各的广播，互相对骂，“人大三红”的开始曲是《解放台湾》，“新人大”的开始曲是《解放南方》。

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我成了“狗崽子”。

还是在五公村时，天津大学的红卫兵带来了一条消息，他们说，查解放前的旧报纸，发现他们的校长高仰云是叛徒，他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出狱的，而且不止高仰云一个人，是一批，薄一波是其中之一。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听父亲讲过他坐牢的事情，他还带我们去北京草岚子监狱旧址，他说：“我当年就是在这里住了四年监狱。在狱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敌人进行各种斗争，还坚持锻炼身体，决心‘红旗出狱’。”我父亲还保存了一张狱中难友戴着脚镣做操的照片。我也听说过，他们是“组织营救出狱”和“用特殊手段出狱”这样的话。大概是1967年3月，毛主席在批阅农业部报送的廖鲁言的材料上批示：此次运动揪出了一批叛徒……。从此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以后就把1936年经北方局营救、党中央批准的经过特殊方式出狱的这些人定为“61人叛徒集团”。

从五公村回学校后，有一次去食堂吃饭时，在食堂门口发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大叛徒张玺的爱女张林南，为了保她的叛徒老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击、压制革命群众造反！……张林南是刘少奇的‘黑修养’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我一进食堂，就有人喊：“打倒大叛徒张玺！”我心里很沉重，回家问母亲：“我爸爸到底是不是叛徒？”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你爸爸不是叛徒。他被叛徒出卖，关进邢台监狱，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至死不供。你爷爷奶奶花钱去赎他，他坚决不出狱，说：‘不能红旗出狱，就把牢底坐穿！’他当时只是共青团的总支书记，却被敌人当作共产党的要犯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在监狱党组织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曾绝食七天七夜，和薄一波等12位难友被判了死刑，戴重镣，因国民党驻军和

张学良的部队换防，死刑才未执行。他是在狱中由团转党的。他入狱和出狱的情况从来没有向组织上隐瞒，我相信你爸爸不是叛徒。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父亲的秘书刘洪声叔叔也对我说：“你爸爸绝不是叛徒！”我从内心相信我母亲和刘叔叔的话是真实的，我不相信我父亲会是叛徒，但是，毛主席、党中央给他们 61 个人定了性，而我又是坚信毛主席和党的，他们毕竟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啊！所以，我感到很困惑，底气不足。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怎么说，父亲的事可以先放在一边，我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又想到在深县农村调查时干部欺压老百姓的例子，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必要的、及时的。所以，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受父亲被打成叛徒的影响，继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自觉在革命实践中经受考验。我的观点倾向“新人大”，也跟他们在一起活动，但由于父亲的“问题”，当时并未从组织上批准我加入“新人大”。

1967 年 3 月 3 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促两派大联合，要求两派坐在一起整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学校开始“3·3 整风”。在我们班的整风会上，我主动检讨自己思想右倾，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把人都往好处想，因此压制了群众造反的积极性，起到了阻碍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我诚恳地希望同学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检查还没做完，一个同学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张林南，你不要避重就轻！最使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是你叛徒老子的问题！你为什么不作检查？”我愣住了，血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也本能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XXX，我告诉你，我没有一顿吃不下饭，也没有一天睡不着觉，我天天高高兴兴地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你别想诬蔑我！”那个带头造系党总支专职书记反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

入党介绍人)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要是在战场上，我一枪毙了你！现在我勒令你摘下红卫兵袖章！你有什么资格当红卫兵？”我马上答：“我是父母所生，但我更是党的孩子，是根据地的老乡给我的性命！我对党的感情比对父母的感情还深，你想拆散我和党的感情，想让我摘下红卫兵袖章，从此不革命，没门！”更恶劣的是，他拿出20元钱（就是一年级暑假我妈妈给同学们的路费钱）说：“这是我借你的钱，现在还你！”我说：“去你的吧，我才不要你的臭钱呢！”就连长征队也有人批判我右倾，说我应当和叛徒父亲划清界限。还有的人说我学雷锋、学英雄都是假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人以前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仅仅一天之隔，知道我爸爸有问题了，就翻脸不认人，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通过批判我，和我划清界限来显示自己革命。我感到不是他们不了解我，而是他们自己的灵魂中有肮脏的东西。这场大革命的确容易暴露人们的灵魂，让我看到真实的世界和人情冷暖。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整风而是整人，毫无团结与联合的诚意，因此十分气愤，当即决定不再参加这样的“整风”，我推开门就走了。

正是在1967年3月，河北沧州地区发生地震，我和班里一起“长征”的两个同学、我小弟弟，还有别的班的三个女同学一起去沧州抗震救灾。没有人组织我们去救灾，完全是自愿的行动。

从灾区回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康生的指使下，我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骨灰堂一室被清理出来。系里的造反派抄了我的东西，从我箱子里把好朋友陈洪的日记也给抄走了。我又生气又委屈，回家后，找出我从初中以来记录了我八年、2900多天的生活、学习、思想和我青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的日记全部烧掉了，一边烧，一边哭，心里埋怨我父亲，“你为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呢？现在说不清楚了，让我连干革命资格都没有了。”我把我保存的几张爸爸的相片也烧掉了。当时，我的思

想很矛盾，既不相信父亲是叛徒，又不敢怀疑毛主席和中央的结论是错的。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无限热爱党、忠于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大学一年级做扁桃体手术的时候，忍住剧痛的动力是来自想到江姐在敌人酷刑下宁死不屈。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像《红岩》中那些先烈一样，被敌人逮捕了，会不会投敌叛变？我坚信不会，我会像先烈们一样视死如归！同时，我也记得，当看到焦裕禄的报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从我看到的、从母亲和叔叔阿姨们那里听到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一心为公的人难道会贪生怕死、叛变革命吗？我困惑和矛盾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最终的选择是：如果父亲确实是自首分子，就和他划清界限，继续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但我期待着中央还有与之不同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当党和毛主席的决策与我的朴素认识和个人亲情相对立时，我采取的态度是，努力改造自己，压制内在的本性，宁可舍弃亲情，也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是在1967年3月，我的姥姥去世了。姥姥在解放战争后期，便从老家出来跟随我父母，照顾我和1946年底出生的弟弟。她患了肠癌，送哪个医院都不收。当时，因为杨尚昆被打倒，中央办公厅被全锅端出了中南海，集中在北京郊区办学习班。母亲进了学习班，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因为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家里的暖气被停了，屋里冷的像冰窖，姥姥躺在床上疼的昼夜呼喊我母亲的名字，可家里连一片止痛药也找不着，串联回来的我守在姥姥身边，只会掉泪，束手无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在痛苦中无助地垂死挣扎，我的心也痛苦到了极点。姥姥叫了一百天，终于停止了呼吸，我亲眼看到她死不瞑目。

1968年，社会上刮起了武斗风，我们学校有的人大造舆论说：“两派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武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武斗没有必然

性，在和平年代，在以工农子弟为主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怎么可能武斗起来呢？当时，两派已经分开来住，“三红”的人住在学校的南侧，“新人大”的人住在学校的北侧。因为我不相信会发生武斗，仍然住在原来的宿舍（已经成为“三红”的地盘）。当年美国刚刚发生了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和平主义人士马丁·路德·金遇刺的事件，有些人就说我也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和平主义者，还送了一个“马路金”的绰号来讽刺我。后来学校形势的发展果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先是两大派在各自的广播喇叭里天天激烈地对骂，然后发展到抓对方“有问题的人”毒打，再升级到两派互相扔石头，在楼顶上打弹弓，“三红”总部（教学大楼）和“新人大”总部（图书馆大楼）的玻璃窗全都被打了个稀巴烂，两楼之间的地上都是石头。这时，“三红”的人只能从学校的正门进出，“新人大”的人只能走学校的北门，如果走错了，就有被对方抓起来的危险。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时偶尔听到“三红”的人说要抓我们班“新人大”的一位同学（他曾犯过错误），以报复“新人大”抓了“三红”的人。我赶快跑去告诉了和我同住一屋的好友陈洪，并和她一起立即通知住在北楼的我系“新人大”负责人：“不好了，他们要抓W同学，抓到‘三红’总部肯定得打个半死，快去救人吧！”我俩先跑到系里去看，W同学果然已经被他们关在一个宿舍里，还没来得及往总部送。我们大声向“三红”的人喊：“你们为什么要抓人？赶快把人放出来！”这时，陈洪班里的一个过去曾追求过她的男同学走到我面前说：“你一个叛徒子弟有什么资格要人？”接着又一脸流氓相地凑到陈洪脸前说：“先检查一下你的叛徒感情再管别人的事吧……”唾沫星子溅了陈洪一脸。陈洪气坏了，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刮子，那个男同学一把将陈洪推倒在地，我冲过去扭住他喊“你敢打人……。”听见动静，从宿舍里立刻跑出一群人来跟我们俩打，我和陈洪真是不要命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这时，

我系“新人大”的人赶来了，赶快拉架。最后还是把W同学给要出来了，而我们俩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架回了宿舍，好几天疼的都不能动弹。这位被救的同学从内心感谢我们，在我们养伤期间，天天给我俩打水送饭。

人民大学的武斗继续升级，从扔石头的初级阶段很快进入使用武器的高级阶段。有一天晚上，“新人大”的人正在校办工厂里制作长矛，“三红”武斗队的人偷袭进来，用长矛刺“新人大”的人，一位“新人大”的同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长矛戳到了脖子上，立刻血流如注，当场死亡。第二天“新人大”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出身的中文系的党员。会上，大家哭成一片。当天中午吃炒菜花，吃完我全吐了，此后好多年再也不吃菜花了。

“新人大”吃了亏，准备加强防备，在总部大楼前挖壕沟，拉铁丝网，不让“三红”的人冲到总部来。1968年5月22日，“新人大”正在修工事，突然“三红”的武斗队冲到工地上，手持长矛，见人就捅。有人听见一个武斗队员一边用长矛戳新闻系一年级一个女生的屁股，一边说：“看你以后还能生孩子！”新闻系另一个女生的鼻子也被长矛挑破了。一位农经系的女同学在俯下身子救人时，被一根长矛从后背捅进，从前胸出来，她戴着这根长矛被“新人大”的人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她也是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次武斗中还有好几个人负重伤。

这几次打死人的武斗对我刺激很大，我对“文革”中出现的许多怪事都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结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没想到同学中也有这么坏、这么狠的人！

武斗中连续死人，两派杀红了眼，武器也从长矛升级到真枪实弹。学校里的工人都是“新人大”的，所以“新人大”就在校办工厂里试做枪、炮和手榴弹。有一次，我们系一个“新人大”的女同学去北京郊区

拉火药，她那天穿的是我新做的一套绿军装，结果路上出了事故，汽车撞到了大树上，火药爆炸，把她炸得浑身烧伤，被送进了友谊医院，我们几个女同学轮流去医院照顾她，后来伤虽然养好了，但身上留下不少伤疤，心里更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

北京高校的武斗愈演愈烈，我们学校是用长矛捅死了人，听说清华等高校用真枪实弹也打死了人。各高校已经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谁也控制不了了。1968年7月，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入高校。宣传队的任务是制止武斗，整风、整党，搞大联合。我大弟弟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学生，他和我都是1965年8月入党。当时，清华、北大是样板单位，整党先行一步，我弟弟整党时转了正。我问他是怎么过关的？他把整党时写的材料给我看，讲的有些是违心话。他说：“不违心怎么办，中央已经给爸爸定了性！”我也借鉴弟弟的材料在整党中做了检查，说：开始对“文革”不理解，思想右倾，对老师和同学的造反行动有压制；后来父亲出事了，认为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很不公平，感到很委屈；现在中央给刘少奇和“61人叛徒集团”定了性，我也应该和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党的孩子，今后要紧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等等。工、军宣队对我很好，他们认为我本质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还算比较顺利地转为正式党员。

按正常学制，我们班应当1969年7月毕业，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我们依然呆在学校里。人民大学从来没有复课，同学们在学校挖战备防空洞，去农村（苏家坨）整党，很多同学参加了北京修建地铁和建“东方红炼油厂”的劳动，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则去了卢沟桥张百发的建筑工地干活。我整整当了半年灰土工，天天铲石头，有时还背水泥，往搅拌机里送，虽然感到腰酸背疼，早晨起来手肿得攥不住拳头，但能够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本领和学到一些生产技能，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他叫高世铭，如今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大半生。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是我大学一年级赞助同学回家路费的人之一。他从家里回来后，主动还借我的钱，我坚决不要，他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送给了我。“文革”前我们不在一个学习组，很少来往。“文革”中，我俩观点一致，都是保守派。无论是串联还是“长征”，亦或是去地震灾区救灾，他都和我在一起，渐渐熟悉、相知。在我父亲被打成“叛徒”后，班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像过去那样热情诚恳地对待我，他是其中之一。虽然同岁，他却像大哥哥一样处处爱护我、保护我，使我很感动，因此很自然地由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展为恋人的关系。世铭的父亲是一名大连造船厂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为了供他上大学，妹妹中断了学业去街道小厂参加工作，妈妈给人家看两个孩子。1968年6月我和系里两个同学及我小妹妹曾与他一起去大连，挤住在他家，天天到大海里游泳。他家虽然条件很差，睡的是大炕和木板临时搭建的床，用的是煤油灯，有一间屋还漏雨，但他母亲总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他父亲和妹妹也热情相待，我们彼此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班一个同学到大连出差时顺便去他家做客，在饭桌上对他父亲说：“你儿子找了一个全国最大叛徒的女儿！……”。这个同学回校不久，世铭家里发来了“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工宣队准了他的假。过了一周他回校了，我关切地问：“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我看到了他脸上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他竟然点着了一支烟抽起来，这也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他艰难地对我叙述：“我母亲根本就没病，父亲不同意咱们建立恋爱关系，他认为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劳动人民，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政治污点，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愿意找一个叛徒的女儿作儿媳妇。我中学的朋友也反对我和你确定关系，怕影响我一辈子的政治前程。他们对我不放心，所以把我叫回家。”

我听了非常震动，就问：“那你怎么办？”他说，给他父亲反复做工作，但是说不通，以至父亲说出：“你如果不和她断绝关系，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的绝情话。世铭也向父亲最后表态说：“你不同意我和林南结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这辈子我结不结婚，和谁结婚，今后你们就管不着了！”他和父亲不欢而散，内心十分痛苦。我听后很伤心，既能理解他父亲的想法，又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明智而果断地说：“你是个孝子，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只养大了你和妹妹两个，我们决不能伤老人的心，一定要尊重他们。我们就不要结婚，以后永远做朋友吧！”这是继父亲被定为叛徒后，命运对我的又一次打击与考验。我虽然很理智，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但感情上却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所幸的是，世铭一直对我很好，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反对而对我们的爱情发生动摇，我深知自己找对了人，能得到这份真挚的友谊和爱情，使我无比感动和珍惜。此事之前，我已经把和世铭谈恋爱的事告诉母亲，她知道后高兴地说“与工农子弟结合，能弥补干部子弟的不足，大有好处！”她见过几次世铭，印象很好，对我很放心。

1970年6月，人民大学的最后两届学生（即69和70届）毕业分配。清华和北大两校的这两届学生已经在3月先期分配工作。我大弟弟这个清华工物系的高才生，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完全被排斥在核工程物理专业之外，分到了辽宁本溪重型机械厂当翻砂工。这时我们家已基本零散，大妹妹1968年（18岁）夏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3农场劳动，母亲于1969年1月去了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这年3月，17岁的小弟弟和15岁的小妹妹一起去延安插队。在大弟弟离开北京之前，妈妈回来探亲，她对我们说：“咱们都走了，房子不要了，交给公家吧！”于是，1970年3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北京就没有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平日住学校，周末就去老邻居谷奶奶（谷牧的母亲）家

里。6月中旬，我们学校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们系有十个辽宁的名额，我想，世铭有可能分到辽宁，他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照顾。至于我自己，到哪里都行，一是母亲长期教育我们，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她是为党而培养我们的；二是身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根本没有自己选择工作的余地。事情也巧，有两个被工宣队动员去新疆工作的同学（是男女朋友）强调有各种困难不愿意去，工宣队就去找世铭谈：“你是党员，能不能带头到边疆去？”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宣队知道我们俩的恋爱关系，就把我也分到了新疆。到边疆工作的同学有30天的探亲假，我给妈妈写信说去新疆前想到干校看看她。她来信支持我到边疆工作，说“3月份不是刚见过面吗，不要那么多儿女情长了，快去新疆报到吧！”接到妈妈的信我大哭一场，她还不知道世铭的父亲不接受我，我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世铭先回家再做父亲的工作，我住在谷奶奶家等候他的消息。在他的耐心说服和他妹妹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做通了父亲的工作，我接到他的电报立即启程赴大连。这一次与他全家的团聚又伤心又高兴，伤心的是我们远走天边，今后不能时时孝敬辛劳了一辈子的年迈父母；高兴的是世铭全家终于接纳了我，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边疆携手共进了。

我们这两届学生走了以后，听说是毛主席指示解散了人民大学，他认为文科大学的学生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关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真正的知识。人民大学的干部和老师大部分去了干校，少部分分到北京其他高等院校。

回想在人民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我的思想变化、行为表现，还是应验了那个规律，即：我自发的认识往往是正确的，一旦改变自己的认识，紧跟上面的指示，反而是错误的。“文革”一开始，我自发抵制，那是发自内心的朴素认知，是正确的；中期，我不断反省自己，

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甚至很不情愿地与父亲划清界限，当我跟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也正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不像一些干部子弟那样，看出“文革”的荒谬和错误时，按自己的意志办，退出激烈的“文革”，或当“逍遥派”，或冷静地思考和学习。我太投入了，太盲目地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走。因为党和毛主席在我心目中太崇高、太伟大了，高于我的父母，胜于我的生命。父亲的问题出来后，并没有影响我的革命积极性，总感到我是党的孩子，决不能因为自己和家庭受到冲击从此就消沉。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我觉得逍遥是可耻的、是“逃兵”的行为。我母亲曾劝我：“你不要去学校了，学校里搞武斗，很危险。”她还多次批评我：“你这个孩子是我们家最偏激的，钻牛角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不服气，反驳母亲说：“你就没有门合的路线觉悟！”³毛主席说了，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我是学政治的，你应当支持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学习和锻炼！”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批评一语中的，当时头脑太热，根本听不进去。与母亲的冷静和坚毅相比，我感到很惭愧，在我身上，确实有狂热和软弱的一面。母亲始终坚信我父亲不是叛徒，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她完整地保护了父亲的日记、笔记等材料。1969年1月，她是带着父亲的材料和姥姥的骨灰去了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父亲的老秘书刘洪声甘愿受牵连，挨批斗，一直坚持说我父亲是最好的人，他把我父亲的大照片放在毛主席像的背后保存下来，还保存了父亲的大量工作笔记、墨迹和他自己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一颗红星》。而我，却烧了父亲的珍贵照片和自己的日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是我遗憾终生的一件事，我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在此后一生中的任何时候，每当回忆往事，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内心很疼很疼。

³ 门合是“文革”中宣扬的一个所谓“有路线觉悟”的干部。

1970年7月底，我和世铭一起去乌鲁木齐报到。全国各地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都要首先去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有二百多名大学生和我俩一起被分配到解放军8847部队农场，地点在北疆奇台，距乌鲁木齐约三百多公里。我们在那里劳动锻炼了一年零七个月。

大学生被编为两个连，一个连一百多人，有三个女生班，一个班12个人。解放军当班长以上的干部，副班长由学生党员担任。我被分到二连八班，是副班长。我们班主要在大田干活，任务是收种麦子、玉米、向日葵、西瓜、哈密瓜，在田间除草、治虫等等。早上八点上工，中午由炊事班的同学把饭菜挑到田间，饭菜里经常有刮进去的沙子，但大家吃的很香，夏天温度高达40度以上，没有什么人叫苦。我们学会了用新疆特有的大镰刀割麦子，觉得比内地的镰刀好用，痛快。最累最辛苦的农活要数浇麦地和打机井。深秋种上麦子后，需要机井抽地下水浇麦子。农场里大片的土地种麦子，浇水的任务很繁重，昼夜不停。原来这种活都是男生干，耗费体力太大，但女生不甘拜下风，主动要求农场批准女生浇水。机会争取到了，每个女生都跃跃欲试。我们连鞋穿进比膝盖还高的大雨靴，手拿大铁铲，走到浇过水的地里，一脚踏下去就陷到泥里，越往外拔另一支脚就陷得越深，有时候脚拔出来了，雨靴却还在泥里，真是哭笑不得。几个钟头干下来，口子没扒开和堵上多少，人却累得贼死。就这样，女生也觉得挺自豪，因为毕竟尝试了只有男生才能干的活。打机井是冬天农闲时干的活，也是昼夜不停。新疆的冬天积雪不化，零下30~40度也不止，打井场地虽然有土垒砌的挡风墙，贴着墙边燃烧着一堆堆的煤火（新疆的煤特别多、特别好烧，用报纸都能点燃），但还是感到冷风袭骨，一停止干活就冻得受不了，回到有大火墙的温暖宿舍，冻僵的手脚才能渐渐恢复知觉。那时我们大学生基本上都能自觉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在劳动中刻苦锻炼自己。

1970年冬天，为了备战，解放军对学生连搞军训，带领我们去拉练。第一天拉练就下着大雪，我之前感冒，那天发烧至39度，我不但没有掉队，一路上还不断给大家朗诵毛主席诗词，带领大家高唱革命歌曲，我心中一直想着革命前辈长征中怎样面对各种艰难险阻，革命先烈如何在敌人酷刑下挺过来……。晚上回到宿舍一量体温，我烧到40度，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班上同学都很心疼我，有的哭着劝我：“明天别去拉练了，身体搞坏了怎么办？”第二天，我又跟着队伍出发了，虽然走起来步履艰难，到后来掉队了，但最终在同学的搀扶下完成了拉练的任务，考验了自己的意志。这次带病拉练吃了苦头，精神上是取得了胜利，身体却遭受了打击，心脏出了问题，得了心肌炎。

我干了八个月大田的农活后，主动要求去干更苦更累的活，到七班去喂猪（这个班的任务是养农场和二连的猪，放连队的羊）。我们两个女生一共养农场的60头猪，那个女同学刚生完孩子，我不舍得让她干重活，都是自己抢过来干。我每天要去食堂边的轱辘井打六担水，挑到猪圈，把食堂的泔水也挑来给猪吃，还要出猪粪，打扫猪圈；每周要用大锅熬两锅猪食，熬猪食的原料是玉米糝，需要自己拉着架子车，把一袋袋玉米穗去场部的粉碎机上粉碎；天暖和的时候，除了熬猪食外，每天还要出去拔一两麻袋草，背回来搞发酵饲料，喂猪吃。此外，要给猪打预防针，母猪生小猪时，需日夜监守。其他班周末可以休息、放松，我们七班却一天也休息不成，因为猪和羊每天的吃喝拉撒睡都依赖我们的付出。世铭看我喂猪太辛苦，他一有空就帮助我干活，比如从食堂里把一桶桶泔水挑到猪圈，在冰封的滑滑的井旁帮我摇轱辘、打水、挑水……，使我倍感温暖。

那时白天忙的没有学习时间，我常常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有时候看着看着睡着了，手电筒开了一夜也不知道。那两年花钱

最多的，就是买电池，值得欣慰的是，在被窝里还真看了不少好书。

领导和同学们对于我和世铭在农场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我俩都被评为优秀党员。

在农场干活确实很累，但吃的很好。我们到新疆时，物质供应比较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就连新疆人最爱吃的羊肉、牛肉，每人每月只供应两斤，细粮只有 50%，很多东西凭票才能买到。我们部队农场自力更生，因此 100%吃细粮，经常能吃到猪肉、羊肉，夏天吃自己种的哈密瓜、西瓜、西红柿等各种水果和蔬菜，冬天土豆、白菜、大萝卜吃不完，每个礼拜天都吃饺子改善生活，过年过节吃的更丰富美味，还给每个班发两盆炒的香香的葵花籽。大家在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农场里也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使我耿耿于怀。我所在的七班有位女生，她比较能吃苦耐劳，是二连唯一的一个非党员副班长。她一心想入党，这本来是好事，但为达到目的，她不择手段。在连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她把别人做的好事都按到自己头上，还讲假话、造谣言，挑拨学生和军人的关系。在我去七班之前，她与班上同学的关系就很僵，我去七班后还做了不少团结工作，她不但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反而散布解放军班长如何重用叛徒子弟（指我）的极端违背事实的言论。大家都认为她品质不好，对她的造假讲用报告很不以为然，她在七班很孤立。但团部领导听了她的讲用，印象很好，把她树立为团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还让她代表学生连出席师里的讲用会。团部领导要求二连党支部讨论发展她入党的问题，在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坚决不同意，反映了七班同学对她的看法，认为她还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支部的其他党员也不同意发展她入党，结果我们连党支部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团里顶起了牛。支部本来有自己的培养对象和发展计划，但每当要

发展其他同学入党时，团领导就说，XXX是团里的标兵，师里的代表，你们应当先发展她入党，再发展别人。我们连党支部坚决抵制了团部这一不合理的要求，坚持了发展党员的标准，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在农场的一年零七个月，我们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发展成，使一些符合党员条件的好同志没有能加入到党组织中来。每当想起此事，我都感到忿忿不平，也深深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了。当10月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后，我感到非常吃惊，没有想到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会与毛主席分道扬镳。这时，我开始对“文革”以来的一系列问题重新思考，并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不是太盲目、太感情用事了？是不是只知全情投入，不能冷静地观察、学习、思考与分析？我深感自己太欠缺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必要的理论功底了，因此不善于独立思考，看不透问题的本质。从此我下决心好好看书学习，在重读《毛选》的同时，也读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补上我在“文革”中最缺的一课。我还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今后凡是自己看不清想不通的问题，宁可不说话、不表态，再也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看清楚的事，不管有多大压力，也要明确自己的态度，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条原则我基本做到了。

1972年2月，在8847部队农场的劳动锻炼结束了，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当时，军队需要一批大学生，世铭被领导考虑过，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终未去成。我们俩一起被分配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汉语编辑部当记者和编辑。

我先是在军事组，负责编辑军事专题的稿件和联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通讯员，一年后下喀什记者站工作半年。这期间在老记者带领下学习了不少新闻知识，熟悉了一些广播电台的业务，尤其是在记者站得到

了全面的锻炼，不仅学会了独立采访，结识了各民族的优秀人物，还学会了骑马，骑的相当不错。我跟车采访了喀什运输车队，司机们经常穿越冰大坂，将各种物质运送到西藏阿里地区。我虽未被批准跟随去阿里的车，却也从喀什一直跟到了叶城。在整整一天的行程中，穿越大戈壁、大沙漠，当然也有绿洲，遇到过搓板路、翻浆路，我坐在司机楼，一路颠簸得脑袋时常碰到车顶。在路上，听司机讲他遇到过的各种险境，心里对他们有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肃然起敬。到达叶城，我浑身像零散了一样，在招待所躺了一天一夜也缓不过劲来，我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到了报道中。我跟着维族翻译，爬到海拔三千多米的边防哨所（山的另一侧就是苏联），体验战士们生活，报道他们镇守祖国边关的艰辛与快乐，还在那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我深入采访了喀什维吾尔族医生，所写民族医生治疗白癜风等疑难病的报道刊登在当年8月的《人民日报》上。我下到克孜勒苏煤矿井下巷道里（有的巷道只能匍匐前进），目睹煤矿工人们如何采煤，感受他们的伟大，写他们无私奉献自己的先进事迹。我采访在医院养病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女州长尼莎汗，她在党的培养下从一个牧羊女一步步成长为柯尔克孜自治州法院的女院长，经受“文革”中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坐监狱长达五年的考验，平反后又任自治州女州长，继续为人民立新功。我被她的传奇经历和感人至深的事迹所震撼，流泪写成长篇通讯《谱写新篇章》，1973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刊载于《新疆日报》的头版全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我还与《新疆日报》的记者一起骑马去克孜勒苏的骆驼场，采访柯尔克孜族老场长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所写报道也发表在《新疆日报》上。……那一段丰富多彩的记者生活和人生历练，至今想起都很留恋。

与我下喀什记者站的同时，世铭也被派往和田记者站，为了便于采

访，他学会了很多维语，能与维吾尔族人民进行简单的交流。他骑着毛驴，上到海拔六千多米的昆仑山上，采访采和田玉的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下山后，崭新的裤子屁股上磨了两个大窟窿，所写〈昆仑采玉〉成为优秀稿，后来被收到专业书中。

1973年10月下旬，我和世铭结束了记者站的工作，回到大连结婚，我母亲特地向“中办五七干校”请了假，从江西进贤专程去大连看望了世铭的父母亲，在他家住了好几天，三位老人成天有说不完的话，彼此印象特别好。

回新疆后我被调到政治文教组做记者和编辑，经常采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些比较大的政治活动和文艺界教育界的事，做录音报道。工作面宽了，业务能力有长进，但不像在记者站时那么有自主性，由自己决定采访的内容和对象，自己写愿意写的东西。这时搞报道，政治性、时效性、命题性强，领导叫你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例如，新疆分配来一批工农兵学员，领导指示我们电台和报社要好好宣传这些大学生志愿到新疆工作的先进事迹，大力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大学生到边疆工作，这本来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就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我们“文革”中和“文革”前毕业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到边疆工作有什么特殊或了不起，家庭也大多是支持的，媒体也没有就此事大张旗鼓地宣传。但在那个被“四人帮”掌握舆论工具的年代，一定要把工农兵学员与老大学生人为割裂开来，提出如今的工农兵学员和“旧教育制度”培养的老大学生是“不可比拟的”，我真不明白究竟什么地方不可比拟。按照领导的指示，我去采访了这些工农兵学员，给我的很大刺激是，几乎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反对他们到边疆工作的，他们是通过与家人“决裂”，冲破“重重阻力”，才得以实现“支援边疆”的愿望，对他们“与传统决裂”的补偿，是“火线入党”。这批大

学生，在离校前几乎都入了党，到新疆后，人人被分配到“好单位”工作，难道这就是我们该提倡和宣扬的精神吗？我对这样的是非颠倒很有气，对一定要宣扬他们的“事迹”很不屑，尤其对“不可比拟”的说法非常反感。因此，在稿子里，我除了客观叙述他们如何来到新疆工作的事实，决不拔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更不把“不可比拟”四字写进我的文中。我越来越觉得从事新闻工作受到的束缚太多。

1975年1月我到郑州生孩子，我母亲已于几个月前从“干校”调至河南省法院任副院长（受我父亲“叛徒”问题的牵连，母亲不能回北京工作）。分娩中因心脏和其他问题，我和孩子险些丧命，身体迟迟恢复不过来，以致在郑州和大连休养调理了半年。7月初，我将女儿留给在大连的世铭的父母，只身回新疆。那时候，我们这批分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学生结婚生子后，都是把孩子留在内地的老人身边抚养，大家全情投入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1975年7月底，我被临时抽调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政治部人事组帮助蒙语编辑部寻找和考察蒙语播音员和编辑、记者。我和蒙语编辑部主任李吉（蒙族），先是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后又去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跑遍各个县，前后近半年时间。我们俩配合得很默契，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热情、主动、认真、好学的特长，工作深得李吉主任的赞许，在当地有关部门协助下，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为蒙语编辑部挑选了一批有生力量。这一段的生活也很有趣，从夏天跑到冬天，从新疆的中西部跑到西北部，辛苦是辛苦，却饱览新疆的壮丽湖山与绮丽美景，在蒙古包里受到蒙族人民的热情款待，品尝他们制作的各种特产，天天喝奶茶，经常骑马，在内地用中药调理了半年而未得恢复的身体，在新疆的广阔天地日渐好转。虽然冬天行路难，皮帽、皮手套、军大衣、毡袜、大头鞋等全副武装，坐在长途汽车上还是冻僵了手脚，但“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的壮美景观尽收眼底，心里不由得默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深刻领悟“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意境……这美好的印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走的地方越多，我发现自己对新疆的感情越深，对祖国的爱越强烈，对各族人民越了解也越亲切。

1975年12月的某一天，我突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久违的《长征组歌》，激动的泪流满面，这是我最喜欢的革命歌曲，我知道这也是周总理的最爱。自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被打倒后，一直不准传唱，但我总是在心中默唱，没人时就大声唱，每一个词我都记得牢，每一支曲我都唱得准。重新播放《长征组歌》勾起我对被打倒或正在受批判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无限怀恋，我多么盼望人斗人、人人自危的“文革”早点结束，全党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能够再现。

1976年1月9日，收音机里不断传来哀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的噩耗突然降临，仍在外地出差的我悲痛地大哭，为什么周总理和我的父亲这两个我心中景仰的人都是在1月8日辞世？为什么好人不长寿？我要能替他们去死该多好！我真觉得天都塌了。我急忙结束了在外的任务赶回乌鲁木齐，回广播电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周总理的灵堂祭奠，⁴ 面对周总理的遗像，我又痛哭了一场。

接下来，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播电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革命事件，天安门广场的诗词传来，大家争相传抄。后来“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家都想不通，多数人不再公开表态，少数人依然坚持原来的立场，我和世铭的家（即办公楼里的一间房子）就成了敢说真话的人交流的地方。我们对外从来公开声称“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是群众真心实意悼念周总理、怀念周总理，绝不是“反革命事件”。在当时“四人帮”的

⁴ 我爱人当时调广播局办公室工作，他负责布置的灵堂。

高压下，要追查“传谣”、“信谣”之事，在广播局整了几个人，我的家也被人告发是“裴多菲俱乐部”。我对因敢讲真话而被整的人非常同情，公开为他们打抱不平，在组织生活会上也对这种为了应付上级的要求就整自己同志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毕竟新疆“天高皇帝远”，政治气氛不如内地浓，再说当时从上到下大家都看透了，所以也整不起来，都不了了之了。

紧接着在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我又回到汉语编辑部“政文组”。“四人帮”将清华和北大作为试点，总结经验，指导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把手也效仿此做法，把新疆大学作为自治区的试点，派出自己的秘书，与宣传部的一位干部、《新疆日报》的一名记者、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共同组成蹲点组，在真抓宣传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直接领导下，决心把“新大”变成“新疆的清华”，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指导全疆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广播电台的领导派我去新疆大学蹲点，负责报道“新大”的批邓情况。这可给我出了一道大难题，因为我的思想与这场运动是尖锐对立的，我不仅反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且到处宣称自己“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完全赞同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的一系列深得民心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下去才有希望。照说，我本应成为这场运动的批判对象，而现在却让我去当这场运动的吹鼓手，这在我心里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宣传有纪律，我不能拒绝领导对我的工作安排，只能自己想办法变通。我以“调查各系运动情况”为借口，对全校的11个系，一个一个地深入了解教育革命的情况和教学改革成果，每遇不懂的知识或问题都虚心求教有关老师和同学，直到明白为止。下很大功夫，用很多时间，写了关于新疆大学师生如何开展教育革命的长篇调查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不少，完全用自己

的语言（绝非官话、套话），写自己想写的事情。对这篇调查报告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对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家乡当农民的各族工农兵学员特别尊重与感兴趣，因为这也是我一直的向往。我热情采访他们，为他们精心制作录音报道。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我一篇也没有写，实践了自己绝不再说违心话的诺言。报社派去的是一位老记者（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我的学长），在《新疆日报》发表了多篇关于“新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我们电台播发的，都是这位老兄写的稿子。时间一长，直接指导蹲点组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到他家里问：“你们电台为什么不写新疆大学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用的都是《新疆日报》的稿子？”我当然不能直接对他说，因为我反对这个运动！只能委婉地回答：“据我了解，新疆大学的运动并不像报社所讲的那样好，我正在各个系深入调查。”以此敷衍过去。

在新疆大学蹲点那一段我每天早出晚归，搞教改调查既积极又认真，接触和学习到许多新知识（例如激光的产生与发射等新科研成果），仿佛在补大学的课。我的积极性引起世铭和身边好友的不解，他们说：既然我们反对“批邓”，大家都在消极怠工，你为什么还那么起早贪黑地跑，“新大”有多少值得你写的东西？为了“惩罚”我，有时回来晚了，他们连饭也不给我留。我理解他们的心情，自己也感到很压抑，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不好自己也不好，不能因为社会的沉沦而沉沦。以打扑克、打麻将、不看书、不学习等消极办法抵制“批邓”，总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应当通过学习与实践去提高认识，用积极的办法去抗争。看看人民大众是怎么做的？他们没有停工停产，什么时候都在实实在在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不“批邓”，不等于停止工作，任何时候，都应该去宣扬善良、勤劳、忘我、无私这些真善美的东西。因此，我永远都不消极、不怠工，而是积极勇敢地面

对一切错误的与不合理的东西。比如“批邓”期间播发的每篇稿子里，几乎都要挂上“三项指示为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等完全颠倒是非的“套话”，我对这些话极其反感，从来不写进自己的稿子里。编辑部主任有时迫于形势，在我的稿中也加上这样的话，只要我发现，就立即去找主任，严正要求去掉这些话，如果非要保留不可，就要求去掉我的名字，绝不肯妥协。搞了两三次，主任不敢再擅自加这样的话了。

在“四人帮”掌控舆论工具的年代，当一名记者真不容易，心里想的，不一定能说能写，说出来写出来的，不一定是真心话。“文革”后期形势明明不好，且越来越差，却一定要歌颂“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人民从内心拥护和爱戴周总理，却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明明不得人心，却要天天鼓吹它的成绩和意义；等等。那时，凡有思想有良心的人，都对“文革”越来越反感，都忧国忧民又忧党，作为记者就更痛苦，不能讲真话，不得不讲假话。越到“文革”后期，我越觉得记者无法再当下去了，实在不能再做“四人帮”的“喉舌”了，于是又萌发了去当农民的念头，在支部会上曾表示过，与其拿着国家的钱在这儿说假话，不如种点地能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富，心里也踏实。当然，这时我已经能够把持住自己，做到宁愿不说话，也绝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宁愿不做事，也绝不做强知是错误的事，不能离开记者队伍，就尽量采写和当前敏感的政治不沾边的东西，宣扬体现真善美的人和事。值得安慰的是，这些我都做到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辞世，我又痛哭了一大场。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我对他整了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不理解，但我仍然崇敬他，我觉得中国要想扭转乾坤，还是离不开他！那些日子，我对国家的前途，党的命运，真是忧心忡忡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从内部得到这个特大喜讯的当天晚上，我家来了六个人聚会，其中五个是我们“老五届”，我们喝酒庆祝。我毕生没有喝过酒，这一天我开了戒，喝了几大口白酒。大家都认为打倒了“四人帮”，国家有希望，都久久地沉浸在兴奋中！

原以为，粉碎“四人帮”后，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例如，“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应颠倒过来了，一件件冤假错案应得到平反了，实事求是和敢讲真话的风气也应该兴起来了……但事实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文革”中形成的思维逻辑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两个凡是”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因此很多事还是想办而办不成。例如，我母亲就曾给她熟悉的一位副总理写过一封信，要求组织上对我父亲的所谓叛徒问题重新审理，给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位领导托他的夫人转告母亲：“61人叛徒集团案”是毛主席批示过的，要平反恐怕很难。

从1976年底，我们双方老人的身体不断出状况。先是我母亲，1975年底她率河南省法院工作队到贫困的封丘县搞“普及大寨县”，整整一年，她为改变封丘落后面貌，使农民尽快脱贫而殚精竭虑，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回家后一顿饭没吃就一睡不起。医院诊断为脑血栓，经抢救，她虽然从昏迷中醒来，却不认人、不认字，右半身瘫痪。兄弟姐妹轮流在医院照顾妈妈，我利用去辽宁朝阳农学院参观的机会，回郑州看望了母亲。世铭的母亲早就患有高血压病，为了带好我的女儿，使我们在新疆安心工作，两位老人不辞辛苦，顾不上自己看病和休息。1978年3月下旬的一天，她突然晕倒在洗衣盆边，送医院被确诊为脑溢血，发了病危通知书。世铭先从乌鲁木齐赶回大连，又发电报把正在伊犁支农的我也叫回大连。看着一直昏迷不醒的婆婆和满面愁云的公公，瞅瞅刚满三岁的不懂事的女儿，我和世铭真伤透了脑筋。婆婆住院后20多天，

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但丧失了语言功能，大小便完全失禁，永远瘫在了床上。这可难坏了我们，今后怎么照顾这一老一小？怎样兼顾家庭与工作？1978年4月，我母亲大病初愈，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第四次执委会会议，会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住进北京阜外医院，继续治疗脑血栓后遗症。经与世铭和公公商量，我先带女儿去北京，一边照顾我妈妈，一边商议今后怎么办。

4月底，我和女儿到了北京，白天带着她去阜外医院陪伴活动不便的母亲，晚上住在亲戚家里。5月下旬，世铭也来到北京，去车站接他时，才知道我从大连走后不久，一天夜里他父亲在家中突然犯病，当时世铭在医院昼夜陪护母亲，父亲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就这样撒手人寰。世铭含泪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又给刚转危为安的瘫痪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送至他妹妹狭小的家里，请妹妹暂时照顾母亲一段时间。

妈妈对世铭和我的境遇十分焦急，她一心想帮我们迈过这个艰难的坎儿。1978年6月初，我大弟弟到北京出差，刘洪声叔叔也正好去医院看望妈妈，妈妈就与我们商量说，“文化革命”结束这么长时间了，“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也该有个说法了，咱们再向党中央反映反映吧。我们一致同意妈妈的想法，于是，大家一起议论，由刘叔叔代笔，以我母亲的名义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又给中组部胡耀邦部长和曾志副部长写了封信，讲述了父亲的情况和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要求给“61人叛徒集团”平反。不久，中组部有两位领导（以后得知，一位是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同志；另一位是中组部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同志）来到阜外医院妈妈住的病房。他们对妈妈说：“你写给中组部的信收到了，耀邦和曾志同志委托我们来看望你，也了解一下你家庭的一些情况。”妈妈非常感谢组织对她的关怀，陈述了自己对于“61人叛徒集团”的看法和我父亲的有关情况。当时，可能由于过分激动，

妈妈说话有些语无伦次。陈野苹叔叔说：“伯仲同志，你先安心养病，我们还会再向你了解情况。”

过了几天，中组部领导果然派人把妈妈和刘叔叔，还有我和世铭接到部里，我们与陈野苹叔叔和老干部局的其他同志又详谈了一次。陈野苹叔叔特别问妈妈，家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组织上会尽力帮助解决。妈妈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反映了我和世铭的家庭变故，要求把我们调回老人身边，以便兼顾工作与家庭；还反映了在武汉钢铁学院上学的我小妹妹，已被支部大会通过入党，但校党委因我父亲的问题而不敢批准。陈野苹叔叔当场拍板，为我和世铭的工作调动分别给新疆与河南的组织部门发商调函；给我妹妹的学校去函说明，只要本人够党员条件，就可以批准入党。

后来我们得知，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一一圈阅了我妈妈的申诉信。6月25日，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母亲的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小平同志批示之后，中组部接过了关于“61人叛徒集团”专案，抓紧审理。我们没有想到，妈妈的信竟成了党中央彻底平反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契机之一。仅仅几个月之后，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将《关于“61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送给了中央。在12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副主席陈云首先站出来要求为六个历史大案平反，第一个，就是关于“61人叛徒集团”案……，得到中央领导和与会同志的热烈支持。12月16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党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宣布彻底平反。

11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组织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

叛徒集团”成员一一补开了隆重的追悼会。1979年3月，国家计委和中组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我父亲张玺举行了“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领导人以及各部门各界的代表有四百余人。

可以说，我妈妈为“61人叛徒集团案”的彻底解决立了一功。我为父亲的昭雪，为全家的彻底解放而无限欣慰，同时，也再一次为自己在“文革”中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和所做的一切蠢事、错事而悔恨，不能原谅自己，决心用今后一生的行动来弥补犯下的错误。

随着父亲问题的解决，我母亲于1979年4月调回原单位中央办公厅工作，我们在北京又有了新的家。组织上让妈妈先养好病再上班。谁知，脑血栓尚未痊愈，可恶的癌细胞又袭上身来，妈妈与癌症顽强抗争了八年，1988年5月8日最终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时年66岁。母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她是我毕生学习的榜样。她的敬业精神，她的爱民作风，她朴实而真诚的为人态度，她勇敢、顽强、豁达、坚贞的性格，都会永远在我和兄弟姐妹身上延续。我们为有父母这样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大写的“人”而自豪！

在中组部的直接帮助下，1978年10月，我和世铭调至河南省工作。我因决心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就不愿意再干媒体工作，坚决要求到学校去当老师，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把我分配到河南省委党校，我选择了去党史教研室做教员，自己对党史素有浓厚的兴趣。世铭也被新调来河南的省委常务书记刘杰要去当秘书。工作刚刚就绪，1978年12月底我们就去大连，用担架将世铭瘫痪在床的母亲接到了郑州，与我们同住招待所，找了一位保姆专门照顾她。我女儿已先于7月跟随我妈妈回郑州，妈妈将她送入了全托幼儿园。一老一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和世铭又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从当编辑和记者到改行当党史教员，我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教研

室安排我着重研究和讲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虽然比较敏感，也没有现成的书本可借鉴，但我乐意接受。因为这段历史伴随着我的成长，我感受鲜活而深刻，认为学习和研究党史，在党校向党的干部讲授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理所当然是我的义务。我花大量时间恶补党史知识，浏览校图书馆里现有的党史资料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华月报》、《河南日报》，主动争取一切机会参加有关研习班，聆听专家、教授的讲课。对我帮助最大的，是1982年和1983年我先后两期（每期半年）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进修班学习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中央党校在胡耀邦校长的倡导下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刚开始设立和讲授这门课。我记笔记记到手指僵硬，生怕丢掉每一个重要环节。学完回校后，又一头钻进省委档案馆，贪婪地阅读大量档案资料，消化中央党校老师的授课内容，结合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决定把自己的科研重点，就放在研究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

我写的第一篇专题论文，就是〈关于反右派斗争〉。我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深感震惊，所谓的全国典型的“右派分子”的言论，许多都是非常正确和中肯的，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针对性。经过整理和分析，我写出了一篇四万字的论文，用大量事实和确凿证据说明，反右派斗争不是个别的、局部的错误，而是全盘错误。虽然反右前的整风运动是正确的，但演变为反右派运动，就错判了形势，采取了错误的手段，使被打成右派中的99%的人蒙冤受屈，造成了影响深远的恶果。因此，我的结论是，应当完全否定反右派运动。在1982年底河南省党史学会成立会议上，我用四个小时发言，阐述了这个专题。与会者反响热烈，说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很多人同意我的观点，也有人持不同态度，认为我的观点与党中央的现有结论有出入。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

结论，要等待实践的检验。这篇论文虽未发表，但活跃了河南党史界的思想，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接着，我力促教研室把研究河南大跃进作为室里的重点科研课题，因为河南大跃进在全国很典型，最早发动，最轰轰烈烈，为全国“创造的经验”最多，媒体宣传的最厉害，造成的恶果最严重。教研室的一半同志花了几年时间，蹲档案馆和图书馆，四处调查访问，深入研究，写出了《河南大跃进研究》一书的初稿。我承担了其中三个专题，即〈关于反潘、杨、王事件〉，〈关于范县的共产主义规划〉，〈河南反右倾斗争〉，都尽心竭力地完成了，自己从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写这本书的阻力非常大，档案馆对一些档案不开放（例如关于“信阳事件”的档案等），时任省委书记不支持，说“河南在全国的形象够差的了，你们要写出这本书，对河南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这本书拖了十几年，后来交给了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其他大跃进的资料统合在一起，命名为《河南的大跃进运动》，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作为内部资料出版了几百本。虽然印数很少，但是我认为对研究党的左倾错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看到的人太少了。值得欣慰的是，我是写〈关于反潘、杨、王事件〉的第一人，这篇东西得到各方面人士的高度赞誉，包括杨珏、王庭栋本人以及当年反对过潘、杨、王的人，不仅收入《潘复生纪念文集》，而且后来被不少写这一事件的人作为基础资料来研究和引用。

1988年我写了一篇〈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在河南〉的论文，提交一个理论研讨会。与会者都说写得好，研讨会组织者决定收入《论文集》。但是，正赶上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左”的文章没了市场，未能收进书中。我认为这是“左”的思潮回潮，很担心批党的左倾错误的进程受阻，也深感“左”的东西深入许多人的头脑，要清除它真难！

当然，在党校讲课是比搞科研更重要的任务，凡是有党史课的班次，我们都要讲授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我的授课特点是，充满激情，联系实际，尤其善于联系河南省的实际，信息量大，严谨细致，学员对我的讲课给予好评。除了在党校内讲，还常被请到电大、工会干校、妇联干校、职工学校、县委党校等讲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经常犯，曾住院抢救。党校领导怕我“倒在”讲台上，从1987年下半年起，不让教研室再安排我的课，叫我在保住身体的前提下，专心搞科研。

在党校期间，我还访问并帮助王从吾、刘汉生、平杰三、喻屏、刘大峰等一些老同志整理了革命回忆录，参与了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党史的资料征集与编纂工作。我怀着赎罪的心情，花了几年时间，先后跑了国家计委档案室、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与山东党史办，广泛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并把母亲珍藏的父亲的日记、笔记和刘洪声叔叔冒险保存下来的父亲的工作笔记、纪念文章等都收集到手，协助刘叔叔，系统整理了父亲的日记和其他材料，合作写出父亲的传记。薄一波伯伯亲笔为父亲的日记题词，十几万字的日记陆续在《河南党史研究》杂志连载。父亲的传记分别刊载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中共河南党史人物传》第三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党史专家对这篇传记给予很高的评价。随后，我和刘叔叔又将父亲的传记、日记、文章讲话和别人写的纪念文章统一编辑为一本书《张玺纪念文集》，50余万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谷牧叔叔为此书题写书名，薄一波伯伯作序，不少老一辈革命家题词。这本书比较全面地记录了父亲一生的革命实践和他高贵的品质，是父亲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的传家宝。在编辑与写作父亲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进一步全面了解了父亲，受到刻骨铭心的教育，更坚

定了做一个他那样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决心。做这件事，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心中对父亲的愧疚。

从1989年下半年，我的目光转移到河南省巩县（现在叫巩义市）的一个叫“竹林”的山村，开始了我对农村历史变迁的跟踪调研和为农民写改革史的工作。这个过去缺土少水、穷的连生存条件都不完全具备的450余户二千多口人的山村，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享誉全国的双文明典型，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前来参观考察，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也于1989年1月10日踏雪访竹林。竹林的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它说明什么问题？它在农村改革中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样的典型有无普遍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到竹林搞调查。当年与一位同事合写的关于竹林党组织如何实践党的根本宗旨的论文，被中央党校收入纪念建党68周年论文集中。1991年，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专家的指导下，我和那位同事又去竹林深入调查，从社会学的角度，写了竹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变迁，被社会学所收入陆学艺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一书（1992年4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从此，竹林的改革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学所的高度关注。1992年，我负责协调组织了一个八人的写作班子（教研室同事和我邀请的作家、学者各占一半），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为竹林写了一本书：《竹林腾飞之路——竹林村改革开放十年》，1993年5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1万余册，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亲自为这本书作序。竹林人民如获至宝，几乎人手一册，竹林领导班子把它作为礼物，赠送给前来竹林参观考察的尊贵客人和采访竹林的各媒体记者。我为这本书的完成付出了巨大努力，不仅自己写了“巨变篇”，还组织和陪同所有作者调查访问，给每个人“铺路搭桥”。我在竹林住了两个多月，交了很多农民朋友，被竹

林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改革热情深深感动，竹林的父老乡亲也对我无话不谈。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回到农村，找到了我的根，实实在在地为我热爱的农民在做事情，而且又和我的专业结合的那么紧！虽然写书对我来说力不从心，但我甘愿吃苦受累，内心的动力促使我对创造奇迹的竹林人民要负起责任。这份情感和责任使我对竹林跟踪了 20 多年，我已被那里的乡亲视为“竹林人”。

写完《竹林腾飞之路》，我紧接着带了一位教研室的年轻同事奔赴河南农村的另一个新典型——临颖县南街村，这是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走的是完全集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农产品深加工的致富之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带头人始终强调他们是“毛泽东思想起家”，但对邓小平理论似乎不大感兴趣。我们带着满脑子问题，在南街村住了十几天，走遍所有企业和各个角落，参加了村里许多活动，日夜找各种人聊天、谈心，与党委书记王宏斌多次深入探讨和交换意见，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四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在和王宏斌交流时，我把南街村的主要经验归结为四点：一是带头人一心为民，忠实履行党的根本宗旨；二是一切从本地实际和群众意愿出发，选择了集体致富和农业深加工的道路；三是借助改革大潮，主动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四是注重用先进理论和文化武装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头脑。王宏斌说，这样分析完全符合南街村的实际。我对他说：“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没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你王宏斌有天大的本事，南街村也富裕不起来。你的‘外圆内方’理念本身就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你已经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南街村的实践，所以，绝对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千万不要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文革’中大寨在这方面已经有深刻的教训。”王宏斌被我的肺腑之言所感动，说：“大姐，还从来没有人这样

诚恳地对我说这些话，也没有人为我们写出这么符合南街发展实际的东西。我一定把这篇调查报告送交中央政策研究室。”此后，我和王宏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南街村也成了我们教研室观察河南农村改革的另一个“前哨站”。

下一个科研目标，我瞄准了林县，即我的出生地。因为民主革命时期这里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是各根据地通往延安的重要地下交通枢纽，这里为革命保存、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林县人民“十万大军战太行”，劈开太行山，修建“红旗渠”，自力更生解决了历朝历代困扰人民生活 and 生产的缺水问题，给全国的老区 and 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改革开放新时期，林县“十万大军出太行”，能工巧匠们发扬“红旗渠精神”，在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搞建筑，再用挣来的钱“富太行”、“美太行”，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老区的致富之路。我满怀激情地准备研究林县的党和人民 50 余年走过的道路，探询他们与时俱进的成功奥秘。我积极物色合作者，打算写林县党组织和人民的“三步曲”，书名都想好了，叫《不倒的红旗》。正当我扑下身子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组织上将我调往香港工作。

无论竹林村、南街村还是林县，都是在改革中依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奋斗走出“三农”困境的好典型，它们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我讲党史，特别注意联系本地区的实际，推介和宣扬本省的典型，激发学员对家乡的热爱，增强干部改变河南落后面貌的信心。

我对自己在河南省委党校 15 年的教师工作基本是满意的，可用“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敢讲真话，联系实际”十六字概括。我专心搞业务，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和“诱惑”，扎扎实实练基本功，不为名利所动。1982 年，从北京来的某考察组曾把我叫省委去征求意见，想调我去河南省妇联任办公室副主任，或到省妇联干校任副校长，

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但表示坚决不愿意,申明想专心搞党史业务、不想也不适合当官的理由,说得考察组成员直笑。

1983年,省委党校在事先未征求个人意见的情况下,任命我为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我当即向组织说明,不想兼干行政工作,能当好党史教员已属不易,但组织上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只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尽力而为。评定学术职称的工作开始了,我积极为室里的老同志争取,待每一位老教员都评上了副教授,我才申请这一职称,1992年底我被评为副教授。我三番五次地向组织推荐室里更年轻的同志接替我当副主任,主动要求辞职,组织上和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人说:“人家求官还不得,你又没犯错误,为什么要辞职?”我坚持要专心搞业务,认为同时兼顾行政工作,结果是两者都搞不好。我一直找到省委组织部部长,说明理由,并且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1986年底组织上总算批准我辞职。我追求的不是名和利,而是真正为人民做点实事,既然做了党史教员,戴上了“历史工作者”的帽子,就一定要对历史负责,要写和讲真历史、真党史,这需要付出毕生的努力啊。

1982年,世铭从省委调省广播电视厅工作,创办了新闻中心,后又做了分管宣传的副厅长。1993年2月,他被调往香港工作,任《紫荆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我于1994年1月也调往香港工作,在新华社台湾事务部,先后任四处副处长、处长。由搞党史到做对台工作,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转折和挑战。可以说,在香港的近五年,我抱着献身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忘我地工作,每天七点多钟上班,夜里12点才离开新华社,三顿饭几乎都在社里吃。有时写东西开夜车,就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睡。比较快地熟悉了业务,进入工作状态。五年中,为促进两岸的交流交往,为做好对台宣传和做台湾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为维护在港台胞的权益等等,我费尽心血,也取得大家有目共

睹的成绩。

我看到许多港人为了香港的回归，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工作，对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感佩服。一些香港同胞很爱国，但是对共产党有看法，尤其是对腐败的官员深恶痛绝。我非常理解他们，注意和这些人交朋友。我们部里有四位港人，其中三位是非党员，他们人品很好，十分敬业，就是没有入党要求，对党的认识有片面性。我经常与他们坦率地交流，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后来发展了一个同事入党，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我离开香港时，这些同事依依不舍，他们说：“张大姐是真共产党！”我心里感动极了，认为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我回到内地之后，听说另外两个同事也先后入了党，十分欣慰，看来他们对党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决心追随真正的共产党。

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能亲自见证香港回归祖国，并能为香港的回归和繁荣稳定直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也是我一生中的大事。

1998年9月，我随世铭从香港回内地，继续在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我珍惜退休前的有限时间，做了几件自己感兴趣并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一是筹备为《中共党史人物传》写《刘建勋传记》。刘建勋1961~197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是“八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把他写传的任务交给了河南省。刘建勋在“文革”中的一些问题没有搞清，中央一直未给他做明确的结论，所以写他的传记难度大，也敏感。这一任务最终落实给我们党史教研室，因我是河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就由我负责先做基础工作。我蹲到省档案馆，花十个月功夫系统阅读了刘建勋在河南工作期间的省委档案，连抄录带复制，收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现都保存在档案馆。我还去广西一个月，访问了近十

位老同志，看了 20 天档案。正当我准备去中组部和中央档案馆进一步收集资料，访问北京和河南的多位老同志时，突然接到新任务，因而没能继续搞下去。虽然后来教研室没有再创造条件让我们完成刘建勋传记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功夫没有白费，我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认识，对于党内较高层干部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许多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把握，都更深入更全面了，彻底摒弃了对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摸到了如何研究党史人物的门径。这种积累对于我的成长成熟十分有益。

二是讲授“关于台湾问题”。香港回归之后，台湾问题怎么解决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党校为使学员更好地学习领悟党的“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党校开设关于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课程。因为我曾在香港做对台工作，领导上便把讲授台湾问题的课交给了我。我知难而进，“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为了备好课，我夜以继日地阅读大量从香港带回的有关材料，系统学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去北京找国务院台办的（在香港一起工作的）同事，虚心求教，结合自己实际工作的体会，写出几万字的讲稿，终于把关于台湾问题的课程搬上了党校的讲台。学员很爱听我的课，感到十分新鲜，了解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对岛内的状况和台胞的心态，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都有了新的认识。无论主体班还是研究生班的学员，都给我的讲课打高分，使我深受感动，没想到从事五年对台工作的积累，回党校后派上了用场。校外有的单位也请我去讲台湾问题。可惜的是，党校的领导班子和校内职工从未要求我给他们介绍台湾或香港的情况，思想比较封闭，未充分利用好自己拥有的资源。

三是继续跟踪竹林的发展，对这个农村改革典型深入研究，不断写出研究报告。2000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召集从事“13 村调

查”（即写《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
庄的实证研究》一书）的作者和13村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听取这些村
自上次调查以来的发展情况，商讨第二个十年的调查如何开展。我参加
了会议，当听到社科院院长李铁映鼓励社科院在农村建立改革的“观察
点”、“前哨站”，要求跟踪十年、50年、100年，每十年要写调查报
告，出研究的书籍，揭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时，我非常激动，
认为从事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回党校后，我和另外两个同事组成调查小
组，负责调查竹林第二个十年的改革发展情况，为社科院写调查报告。
2001年3月中旬，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折晓叶（她是费孝通的弟
子）和我们一起到竹林，指导我们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她对
我们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大变动时期，受到全世界瞩目，许多外
国学者纷纷到中国来做研究。比如美国的三位分别从事社会学、政治学
和历史学的学者，在我国开放之初就来到河北省饶阳县，以五公村为重
点开展调查，多次深入农村，向各个阶层的人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花
11年时间，写出了一本探究共产党的政权与农民的关系的书籍，非常
有研究价值。一个在美国大学里教社会学的台湾学者，利用半年休假时
间，来到了我国福建的一个村庄，逐渐与那里的农民相熟相知，和党支
部书记成为朋友，他以支部书记口述村史的形式，写了一本《林村的故
事》，透过一个村庄的发展史，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这本书成为
广受欢迎的社会学范本。她还介绍了自己的恩师费孝通是如何在老百姓
的田间炕头搞社会调查的，推荐了费老的几本经典著作。她把自己的近
作《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送给我们，那是她
在深圳的一个典型村庄住了两年多，学习费老的方法做社会调查，通过
研究和分析这个村的实例，指出西方社会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是错误的，
不适合中国乡村的实际。她做了“证伪”的工作，很不简单。她和

我们一起做访问时，都是带着录音机，动脑子发问，详细做记录，每天晚上将当天的记录进行整理，连吃饭和散步都和我们一起探讨竹林的特色和问题。她回到北京后，专门给我们买了三位美国学者以及那位台湾学者的书寄来。看费老、晓叶和这些外国外地学者的社会学著作，真使我大饱眼福，恶补知识的饥渴，灵魂受到触动。我很敬佩这些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我想，外国学者和台湾学者都那样关心中国的改革，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做呢？这些学者的榜样深深影响了我，我痛恨学术界的浮躁风气，决心向他们那样搞调研，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

从2001年至2006年，我每年都去竹林住一段，长则八个月，短则十几天，亲身参加竹林的各项活动，广泛交朋友，访问的人次不下二三百，笔记达几十本，录音磁带一百余盒，几乎所有的档案资料都阅读过，摘录了好几本，竹林的党委书记赵明恩称我是“竹林的资料库”。2002年4月完成了调查报告我承担的两大部分，约十万余字，提交竹林党委。因社科院社会学所全力为党的“十六大”进行有关重要课题的研究，未能继续组织第二个十年的“13村调查”。2003年我们教研室决定独立为竹林改革开放20年写一本书：《竹林深处有文章——一个被联合国关注的河南山村》，我承担主要任务。2004和2005年，我分别将已经写完的部分共14万余字提交竹林党委，因其他人没有动笔而耽搁下来，但我写的部分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每逢上面重要的单位或领导来竹林调研，竹林党委都会把我写的东西提供给他们作参考。2006年和2008年，我又分别从竹林党委的执政能力和竹林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之路的角度写了两篇调查报告，都刊登于公开出版的理论书籍中，竹林也将其收录在他们该年度《资料汇编》中。

我从1989年与竹林结缘，20年来，亲眼看着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

的小山村一步步脱贫致富，走上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从一个行政村，演变为一个具有“自治”特色的建制镇，并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试点镇；从只有几个依靠本地资源进行粗加工的小企业，到具有上市公司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每年向国家纳税几千万至上亿元；从石厚土薄，水源奇缺，一棵竹子也没有，到处是荒山秃岭的生态环境，改造成绿水青山、竹林茂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鸟语花香的观光游览区……。我认为，竹林走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和竹林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才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巨变。竹林之所以能走上这条路，除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好外，关键是有好带头人赵明恩和李淑转。他们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老传统，与时俱进地追随新观念，并将两者完美地统一于一身，领导竹林健康发展。这就是竹林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最根本点。今天，像竹林这样的领导班子不多，但是，没有绝迹，这就是希望。我希望竹林这个典型的星星之火终将形成燎原之势，带动我国广大农村走出“三农”困境，健康发展！

四是将“红旗渠精神研究”争取为省级重点科研课题。研究革命老区林县（现在改名为林州市）所走的不同于其他老区的道路始终是我挥之不去的强烈愿望。从香港回来后，我不断鼓动和说服教研室同志研究这个专题，为大家提供了不少我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建议教研室组织大家去实地参观。教研室接受了我的意见，经过先期论证，将“红旗渠精神研究”申报为河南省重点科研课题，2007年得到省里的批准。虽然我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承担具体任务，但室里的年轻同志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认真研究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与时俱进的光辉历程及其宝贵经验，推进全省人民学习和发扬“红旗渠精神”，改变河南的面貌，我就非常高兴。这也是我这个“林县人”（我历来称自己为林县人，因为这里给了我生命）对家乡人民回报的一点心意。

五是推动教研室与革命老区建立联系，为老区的建设出谋划策。鲁山县在解放战争时期是豫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豫西区党委所在地，地处伏牛山，为大军南下和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解放后没有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鲁山县党史办主任为在鲁山建豫西革命纪念馆一事找到我，向我征集父亲的遗物，因当年我父亲是豫西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我了解了县里的情况，为老区人民还不能彻底脱贫而心痛，也为县委领导班子改变鲁山落后面貌的决心和具体规划而感到鼓舞。我将父亲的一些遗物和纪念文集、墨迹送给他，让他复印了父亲的部分日记、笔记。他邀请我到鲁山参观，并希望我对鲁山的发展提出建议。我深感自己和我们党史教研室有义务关心老区的发展，有责任帮助老区走出困境，于是找室主任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教研室将鲁山县也作为一个联系点，对革命老区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调研，为鲁山的发展出谋献策。室主任欣然接受这个建议，认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好途径。这年秋天，教研室全体同志租车前往鲁山县调研，县委把我们作为贵宾来接待，带我们参观了豫西革命纪念馆（也是邓小平在中原局时的一个住所）和邓小平的半身铜像，游览了著名的“石人山景区”，县委“四大班子”成员与我们一起座谈、交流，虚心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对县委充分重视开发当地的“红色资源”高度肯定，建议将绿色旅游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利用鲁山两方面的丰富资源，做大旅游产业；还建议利用中原局和邓小平曾驻过鲁山，在鲁山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做过重要报告的条件，可与中央党史研究和文献研究部门及一些曾在豫西工作过的老同志联系，开展有关党史研究，请老同志到鲁山指导工作，关切鲁山的发展和建设。县委认为我们的建议切实可行，希望我们能经常到鲁山调研，为他们出些好主意。确实，从2004年以来，我和教研室几个同志几乎每年都去鲁山，先后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

（全国）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纪念邓小平“4.25”鲁山会议重要讲话 60 周年的会议、“程村整党”纪念馆开幕仪式等等党史党建活动，每次不是带去论文或研究报告，就是现场发言，既支持了鲁山的发展，又促进了我们本身的党史研究工作。每年去鲁山，我们都发现有很多新变化，这个老区已经追上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在迅猛地发展。

20 年来，我们党史教研室在河南农村先后建立了竹林、南街、林县（林州市）、鲁山县四个联系点、观察站，跟踪着它们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变化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从中挖掘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我为建立这些点付出了巨大热情和心力，是积极的倡导者、联系人，因为我有一个深刻的理念，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搞教学和科研不能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在书斋里“嚼别人吃过的馍”，而应投入活生生的实践，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仅做出自己的“学问”，更为人民做点他们需要的实事。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也不一定能够立刻见“功效”，但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素养和基本功，也是学术规律使然。

现在学术界浮躁成风，急功近利成为多数人的行为模式，深层次的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合理。比如，学术职称是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的，而评定职称所规定的条条框框多为讲求数量不注重质量，只看你在什么刊物发表了多少文章，写了多少著作，排名第几，却不问这些文章和著作产生了多少社会或者经济效益，有无实用价值；决定能否授予职称的关键，不是有关专家、学术权威的意见，而是人事部门的教条，等等。这种种不合理、不合学术规律的导向，就把人们引上了为评上某某职称而搞“科研”，甚至为评上什么职称而工作、而奋斗的错误道路。我痛恨这种现象和这些不合理的、亟待改革的体制、机制，但无力改变现状，只好以自己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并努力影响身边的同事把眼界

放宽放远，多做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如今，竹林镇已成为省委党校的教学基地，几乎每一期学员都要到那个“大讲堂”上一课，“充电”，见识见识农村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这件事我感到很鼓舞、很开心。不少人问我：“你为什么不申请正高级职称（即正教授）？”我的回答有两条：一是不愿意“打破头”地去和别人竞争；二是没有时间去他们要求的事情。有些人对我惋惜，我自己很坦然，因为我没有偷懒和消极，而是在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 2006 年退休了，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因为背负了许多“债”，很多想干的事还没有干，有些事只有“头”而没有“尾”，有些答应了别人的事还没有兑现。我想，只要身体允许，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一生虽然平平凡凡、默默无闻，却也充满波折，丰富多彩。我们是伴着共和国的脚步，伴着党的辉煌、挫折和成熟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见证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觉醒，我们还将继续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我完全同意党的 11 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评价。发动“文革”以及“文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晚年的重大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不幸，留下了许多血的教训，应当完全否定这场运动。但“文革”十年的历史不能完全否定，人民的生产与创造，外交、科技的发展等等都应当肯定。如果不吸取“文革”的教训，会不会再犯“文革”的错误？我看可能。现在一些干部腐败，追求政绩，一风吹，一刀切，搞形而上学，走极端等等，屡禁而不绝。有人怀念“文革”，希望用激烈的斗争形式去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我不希望出现第二次“文革”，

动乱是灾难，伤害的是国家和人民。

虽然我和我的家庭吃了“文革”的不少苦头，但我并不痛恨犯了严重错误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党的 11 届三中全会上共产党人自己能拨乱反正，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30 年里，我国在各个方面向世界水平看齐，不管谁怎么说，我是感到欣慰的。胡锦涛、温家宝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表，他们的务实、亲民作风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他们做的事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人民心愿，继承了党的宗旨和老一代革命家的作风，我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现在党的队伍不纯，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女儿在大学生时曾为要不要入党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要入党就要做像你姥爷、姥姥那样的共产党员，做像你父母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个人吃亏，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做不到，干脆别入，现在徒有其名的党员太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太少。”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信仰，我们尽了我们的力，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做了我们该做的事，虽然留有遗憾，但也圆了我们的梦，实现了“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的理想和价值观。我最痛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改变成“以我为中心”，我讨厌自私自利的人，我蔑视他们的价值观。在香港，我看到很多很敬业的港人，这是普世价值。就像真善美一样，各种宗教的核心都是真善美，让世界充满爱。我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去为国家的盛世补台。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个生下来只有三斤重的孩子，能活到 60 多岁，看到国家一天比一天兴盛，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已经很知足了。